

现代中国建筑之“意”的追寻与升华

——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的空间与园林

(1950—1965年)

Pursuit and Sublimat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 of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The Literati Garden and the Space of “New Camp”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aiwan Province from 1950 to 1965

黄庄巍 | HUANG Zhuangwei 刘静 | LIU Jing 邹广天 | ZOU Guangtian

中图分类号: TU-092.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2024)04-0084-13 DOI: 10.12285/jzs.20240305001

摘要: 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中前期,在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脉络分支延续与世界现代建筑思潮直接影响下,由大陆迁台建筑师及其学生组成的“新派”建筑师群体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体系化的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建构并形成理论流派。本研究将基于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传播和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延续之“双重维度”视域,发掘本时段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对现代空间原理、流动空间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跨文化理论融合与建构,阐述其在现代主义视角下对文人园林的价值思考及其创新价值,以及对营造学社思想的反思,以期完善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相关研究,补充战后中国建筑理论界在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程中的叙事。

关键词: 中国建筑理论、现代中国建筑、建筑空间、文人建筑、台湾建筑、中国园林、中国营造学社、汉宝德

Abstract: From the early 1950s to the middle and early 1960s, under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the branch of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modern architecture trend, the “new camp” group of architects composed of mainland architects and their students in Taiwan province carried out systematic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aiwan province and formed a theoretical school. Based on the “double dimension” perspective of the spread of the world’s modern architecture movement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a’s modern cultural trend,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modern space principle, mobile space principl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y the “new school” architects in Taiwan province during this period, and explain their value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value of literati garde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sm, as well as their reflection on the thought of China construction socie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supplement the narrative of the post-war Chinese architectural theory circ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world modern architecture movement.

Keywords: Chinese Architecture Theory,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Space, Literati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in Taiwan province, Chinese Garden,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Pao—Teh Han

作者:

黄庄巍,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刘静, 厦门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副教授;

邹广天,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金号 52378040)。

录用日期: 2022-09

一、历史背景: 1930—1940年代世界现代建筑与中国文化传统融合的思想新芽及其分枝

现代化与中国化是中国建筑转型发展的核心课题。自1920年代后期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开始影响中国以来,如何借助现代主义建筑及其思想内涵以探寻“真正”的现代中国建筑^①,构成了

中国建筑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发展脉络。1930年代,结合学院派设计方法与官式建筑造型特征的“中国固有式”日趋成熟,却也存在诸多问题,寻找“中国建筑新作风”逐步成为中国建筑界新的探索方向。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由于中国近代建筑师群体在1945—1949年前后海峡两岸的不同流向,现代中国建筑发展脉络在1950年代后产生分枝,并在1950—1970年代末

期分置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政策与外来影响之下，形成了不同的样貌。

其中作为直接浸染于世界现代主义主流思潮的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脉络分枝，自1950年代开始，我国台湾地区建筑界的“新派”——包括金长铭、贝聿铭、王大闳、贺陈词、陈其宽等为代表的大陆迁台建筑师及汉宝德、方汝镇、华昌宜等青年学生，以现代建筑思想为理论发展工具，对现代中国建筑之形态功能、空间、文化与社会等多个范畴进行了深层次思考和理论建构，形成了193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界思想新芽的重要续篇。“新派”建筑师兼具中国传统家学和现代建筑教育背景，使这一流派带上了浓郁的中国文人传统色彩和跨文化特征，亦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整体影响下，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结合世界现代建筑运动在现代中国建筑理论探索中的映射。

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下，延续自中国大陆的两条“现代中国建筑”路线在各自发展中产生了激烈的论争。该时期国民党当局为“延续道统”而大力发展“中国固有式”，卢毓骏、黄宝瑜等文化守成主义者亦基于中国官式建筑传统与儒家典章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官方”色彩浓烈的理论建构，并在营造学社学术思想影响下进行了以官式建筑为主导的中国建筑历史书写^②。与之相对立，“新派”以现代建筑与文人园林作为直接的中西文化要素来源与依据，提倡现代主义、反对学院派及“中国固有式”，提倡文人审美，推崇园林美学，批判以官式建筑为主导的传统历史叙述，更以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姿态，对当时文化保守主义影响下的建筑实践、学术研究直至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社会现状进行了一系列颇具深度的反思和批判。^③

台湾“新派”建筑师1950—1960年代中前期的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建构及其相应设计实践，形成了二战前后完整的现代主义主流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碰撞融合最为典型的样本，亦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整体图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具备丰富的理论研究价值与历史、现实意义。但由于

1949年后两岸隔绝等原因，以上历史叙事并未得到充分发掘与价值认知，尚未系统纳入中国现代建筑转型发展脉络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整体视野中进行审视与解读。

本篇将通过分析1950—1965年间“新派”建筑师联结现代建筑空间思想与中国文化要素的跨文化理论发展，阐述其对现代中国建筑空间意境范畴的探索与思想升华，论述其在这一思想脉络下基于现代主义视角下对明清文人园林价值的再发现，以期勾勒出这一重要理论续篇之轮廓，揭示其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中的贡献、价值与意义，补充关于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相关研究。

二、虚无、移情与游心于物：“新派”融合现代空间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艺术的理论源流与发展

空间是现代建筑的核心，“建筑作为容积”（architecture as volume）与“建筑作为体量”（architecture as mass）是现代建筑与学院派建筑在生成方式与内涵特征上的本质认知差异^{④⑤}。密斯式“流动空间”对现代建筑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⑥赖特对道家哲学中朴素空间观的推崇则广为人知，塔里埃森刻有老子言论“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其设计思想的生成过程亦有不可忽视的东方因素，这一对中国元素的“大师认证”鼓舞了当时探索现代中国建筑的一批中国建筑师，并很可能对1940年代以来联结现代建筑理论与道家哲学的理论建构产生了直接启发。^⑦

1951年，重庆大学毕业生、旅美建筑学者张一调^⑧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筑系完成博士论文《道与建筑》，认为对空间的深刻理解早已存在于中国人的传统哲学思想之中。他将老子《道德经》中关于“有”与“无”之间的朴素二元辩证法，运用于解析现代空间中的“实体”与“空间”概念，认为所谓空间“在老子的论题中，被称为‘无状之状’或‘无物之象’”，老子关于“变”的思想，可解释为“有”与“无”对立并可相互转换的状态，“空”这

一要素以其“无形性”赋予进一步发展的无限可能。他亦将随时间流逝和视觉运动中所生成的“四维空间”“流动空间”诠释为道家哲学之“变”，认为“建筑的构成都基于时间的因素，即生理的机能与心理的经验两方面，把‘时间’作为有机性的主要因素，建筑故可解释为‘人类生活与时间经验之空间表现’”。这一融合现代空间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对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人建筑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启发与影响。^⑨

同年，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唐君毅^⑩在我国香港地区出版《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并于1953年在台湾地区出版并多次再版，对我国港台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唐君毅认为，“中国艺术之精神在可游，亦可改谓中国艺术之精神在虚实相涵”，在与西方艺术的比较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建筑、书画、音乐和雕刻各艺术门类特征，认为彼此“相互为用，相互贯通，相通为契”，而“中国人又力求文学与书画、音乐、建筑之相通”，即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有着共通的精神血脉。与“高卓而不可游”，即强调纪念性、只能外在欣赏的西方古代建筑相比，中国建筑的精髓在于“虚实相涵”——“藏修息游”，“掩映于积翠重荫之下，含若隐若现之画意”，是一种“可亲近”“可游”，并最终令人“心物合一”，从而达到“忘我境界”的建筑。“虚实”与“可游”精准勾画了群体组合丰富、廊院体系发达的中国建筑特征，且与现代建筑之“空间”与“流动空间”思想内核存在相通之处，亦对建筑界产生了启发。^⑪

在以上思想与文化脉络的交叠下，1950年代后，“新派”对现代空间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融合。他们借助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中后期修正思潮中对“机械化”“样式化”“缺乏文化”的反思和“地域性”“文化性”的提出，在中国近代以来“西方物质，东方精神”之融合东与西、传统与现代的理论构架下，围绕“空间”与“流动空间”两个现代建筑核心概念联结中国传统建筑及

文学、美学、哲学要素进行跨文化理论发展，发现并总结了中国文化中的“动态之美”，建构了中国建筑“不仅具备现代建筑精神更可贡献于现代建筑发展”的价值体系，论证从“文化精神”入手摆脱“型”的束缚以发展现代中国建筑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在这一过程中，亦进一步发现、提炼了文人园林之于现代中国建筑的重要价值。

三、空间：从“无”至“道”的中国化理论联结与升华

“赖特自谓在建筑上是深受老子哲学的影响……这真是值得我国建筑师们深思猛醒的”^⑫，“密斯之基本思想是基于 Less is more 的哲学，这是与老子的哲学思想极相近似的，因此他是把建筑看作一个整体的被覆体 (Shelter) 加以处理，愈简单愈好，再于这个被覆体中解决了人们对该建筑所有的需要”^⑬，“当其无，有室之用，这里的无就是指空间”^⑭……“新派”翻译、引述和解读赖特、密斯、吉迪恩等人的现代空间理论，以跨文化（包括建筑、文学、美学、哲学等范畴）的视野深入诠释现代建筑“形体—空间”这对基本概念，在与学院派“样式建筑”之“平面”“外形”“装饰”“物质”等要素的二元对立式比较论述中，空间借由“无形抽象”之特征逐步与“留白”“意境”“情趣”“精神”等中国文化语意产生联结。

金长铭将现代建筑之“三度空间造型”对比学院派建筑之“二度空间造型”，认为空间感所形成的“情趣”方为建筑艺术的精髓。他写道：“平面决定一切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是整体空间的观念”“仅仅视觉上的满足不

能予以身心上的适意与情趣，适意与情趣是整体建筑的给予，也绝非单纯建筑上的功能所给予……于是这满足情趣真意的空间构成，成为建筑造型上另外一种深邃的含表……单纯外形实体之美，不足以为美，而内部建筑构成与情趣之运用才是建筑艺术精深之处”^⑮他还以武学为喻，将学院派式的、注重外观的“有形的”建筑设计比喻为“刚性的”少林派，将现代建筑“无形的”空间设计比喻为“柔性”而更为高明的武当派（太极），“中国武术，分内外两家……外家（少林）……属于刚性，看起来热闹。内家（武当）属柔，看起来弱不禁风，柔弱无骨，但是功夫精湛之处，正是掌风剪水，金石为开，那才是上乘。以上譬诸建筑，前者正是单纯外形实体之美，不足以为美，而内部空间构成与情趣之运用才是建筑艺术的精深之处”^⑯。

身兼知名现代中国画家的陈其宽，以传统阴阳观念、国画之“留白”与篆刻之“阴纹阳纹”来阐释空间概念和空间生成方法。他写道：“空间也可说是体的反面，或是不可见的形。如果体是阳，空间就是阴，如果体是正，空间就是负……当我们看一张国画时，我们发现中间有很多空白的地方，与西画迥然不同，我们由这里发现了空气、远近、高低，也就是空间。这是我们国画中最值得发扬的优点之一。”“治印中所谓阳纹、阴纹，正就是形中的体与空间，也更进一步启示了我们，阳与阴可以互相对换，有同等的重要。……治印是一种极抽象的艺术，其中线的布置，并不象征自然界的任何形态，可是它却具有其内在的，自己的美，自己的无形中的力量，予人以不同的感觉与反应。”^⑰（图1、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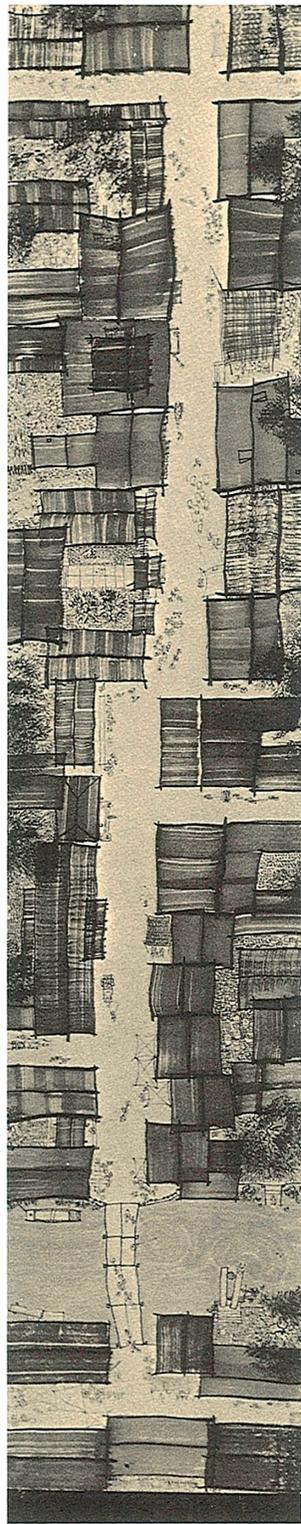


图1：水墨画《街景》（陈其宽，1952年）



图2：具文人画风韵的东海大学全景图（陈其宽，1956年）

运用文人书画类比、诠释空间出现在诸多论述中,当时艺术界对现代中国画创新探索也与之产生了互动与启发。唐君毅认为文人画“达画中最空灵之境界。文人画之高,即全在善用画中之虚白处,元人所谓虚白中有灵气往来是也”^⑩,张一调的《从老子哲学的实践性看建筑形式中无形内容的存在》采用北宋《溪山秋霁图》等文人画作为插图,贺陈词认为“中国书法很符合现代艺术抽象画的理论”^⑪，“五月”画派代表人物、中原理工学院建筑系青年教师刘国松^⑫认为“中国绘画重意不重形之思想早在南北朝时即发生”，较之西方印象派要早1400多年，他以“重意不重形”文人画的美学精神类比对现代建筑产生极大影响的表现主义和立体主义画派，认为其具有共同的精髓，即通过抽象摆脱了具象的形，而进入更为高级、“超旷空灵”的自由境界。“唐代柳宗兴盛之后，文人画家受其影响甚大。其宗旨清净简真，主张直指顿悟，重精神而轻形式……中国画意境的创成，既需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需得庄子的超旷空灵。”“最无限最自由的莫过于心灵，所以最高的美都是心灵的表现……也唯有纯是心灵表现的艺术，才有最高的美……表现主义与立体主义对自然外形的破坏，而趋向个人心灵的表现，更进而迈入纯是心灵表现的抽象领域。”^⑬

整体视之，在“道器之辨”原则下，“新派”对“空间”的内涵解读经历从“无”至“道”的中国化理论发展过程。“道”与“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⑭，建筑在这一二元范畴形成的价值体系视角下，“精神”优于“物质”、“内部情趣”优于“外形实体”、“三维空间”优于“二维平面”，是否运用“抽象”的空间成为设计高下的判断准绳^⑮。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在与中国文化的比较联结中，他们发现对立于具象之形、无法触摸只能体悟的“空间”实具备了“无”的一切特征，而“无”——这一中国文化精神的灵魂，可以是文人挥毫起落之间的留白，可

以是诗词曲赋中只可意会的气韵，可以是老庄哲学里的虚空与逍遥，正贯穿于万物，并成为其美的灵魂。经由“无”的中介，作为现代建筑核心思想并“无形而无处不在”的“空间”，进而被视为与中国文化中具有本源地位、存在于万物却没有具体形态的“道”若合符节，世界建筑大师“驾驭空间而不为空间所限制”的设计水准，也被他们视之即为达到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超脱“极境”。^⑯

换言之，在与中国文化的比较互动中，作为现代建筑根本原则的“空间”经由“无”，被赋予了“道”的意义，与此同时，强调抽象、注重意境、重精神轻形式的“中国文化精神之道”则借由“无”，被赋予了现代中国建筑中如“空间”一般的根性地位，最终被视为能使中国建筑摆脱繁复的“固有之形”之束缚，进而达到无限可能的根本方法与原理^⑰。而这一“道”，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在1950年代后针对现代主义建筑“样式化”“机械化”“冰冷无情”^⑱“缺乏文化精神”^⑲之缺点而产生的修正思潮中^⑳，类似“（中国文化）在最少物质中，见最多之美，表现更丰富之精神活动或心之活动，从‘至小’以观‘至大’，于‘一物’见一‘太极’……”^㉑、“我们深感我中华民族精神传统之弥足珍贵”^㉒之语屡见不鲜，中国文化精神经由与空间概念的联结与升华，也被“新派”视为古老中国贡献于世界现代建筑运动的良方。

此外，空间虚无纯净的“精神性”“纯粹性”还导向了“讲求精神生活，推崇高山隐士”^㉓的隐逸思想。对这些极端排斥当时国民党政权官方“复古思潮”、身处“建筑沙漠”^㉔而又无力改变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而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醉心于空间精神、问道于老庄哲学的追求，是高洁人格的自证，更潜藏着对当局与俗世的自我疏离。

以上空间与“中国文化精神之道”的跨文化联结，带有浓郁的文人色彩，为“空间”这一现代建筑核心要素赋予了丰富的中国文化意蕴。他们一方面以中国人

易于理解的方式有效地传播了“空间”的概念，另一方面理论论证了从“文化精神”上传承发展中国建筑切合现代建筑本质、可优化现代建筑运动，并将其作为特殊历史情境中的心灵栖身之所。这一理论建构将对现代建筑空间的理解拓展至广义的中国文化领域，在达成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对话的同时，亦重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价值，充实了现代中国建筑的理论内涵。

在他们全方位推动下，1950年代后，“空间”一词已深入人心并承载了多重积极文化意义，成为建筑论述中十分常见的话语概念，取径通过“空间”而非“造型”来发展现代中国建筑，也成为台湾地区建筑界的重要倾向。

四、流动空间：从“气韵生动”到“游心于物”的跨文化语意流变

1941年吉迪恩的《时间·空间·建筑》一书将现代建筑的形式观点导向整体性空间立体观，进而引出动态的空间渗透，即现代建筑“四维”时空体验^㉕。1940年代中后期，贝聿铭将庭院、园林的移步换景流线联结流动空间设计手法，运用于上海华东大学等设计之中。黄作燊在1940年代的教学中开始将流动空间联结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气韵生动”，将行走于中国建筑间的时空体验视为中国传统建筑之精神所在^㉖，引述了文人园林中曲径通幽、层层递进的动态空间之美和《红楼梦》中宾客游园吟咏的场景，认为中国建筑艺术之精髓存在于人与建筑互动之间。^㉗

1950年代后，在诸多思想脉络的影响下，“新派”发展了这一理论新芽，“流动空间”概念及其设计原则在设计探索与理论发现的互动中，在与传统庭院、园林及文人美学的联结、引申中，逐步完成了其传播与中国化过程。他们翻译吉迪恩、密斯·拉斯金(Eugene Raskin)等相关空间理论，普及流动空间基本概念^㉘，发掘流动空间概念与中国传统的概念关联，认为其即为空间叠加时间要素的“时空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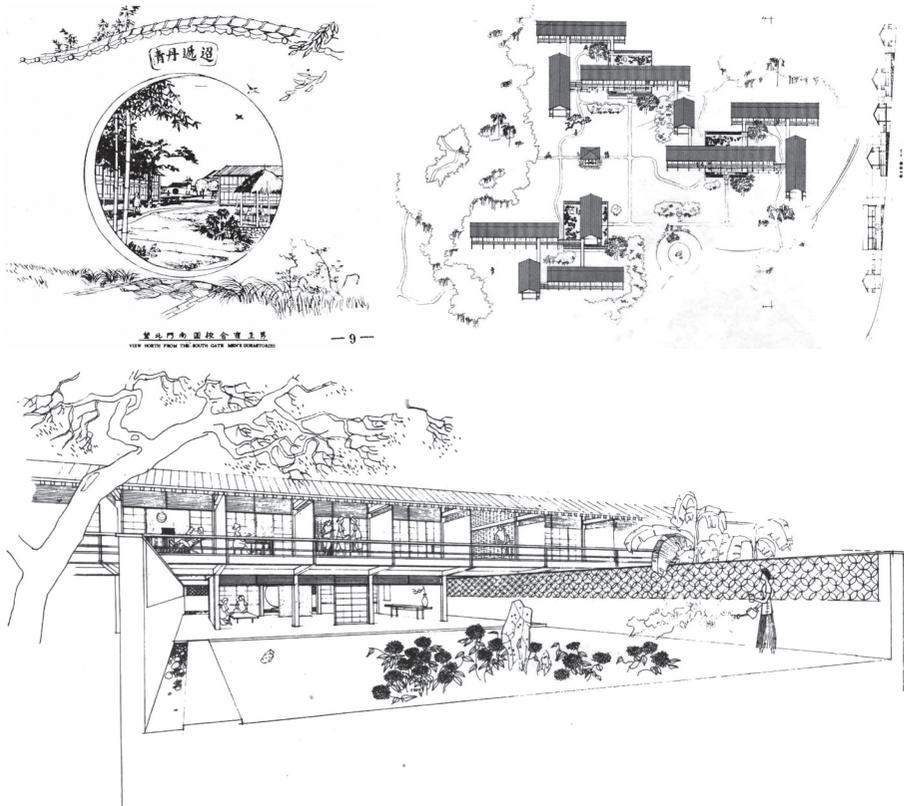


图3: 东海大学学生宿舍设计(陈其宽,1956年),建筑体块相互错落、脱开,构成“类风车型”的新式院落群组,融流动空间与园林精神,营造现代中国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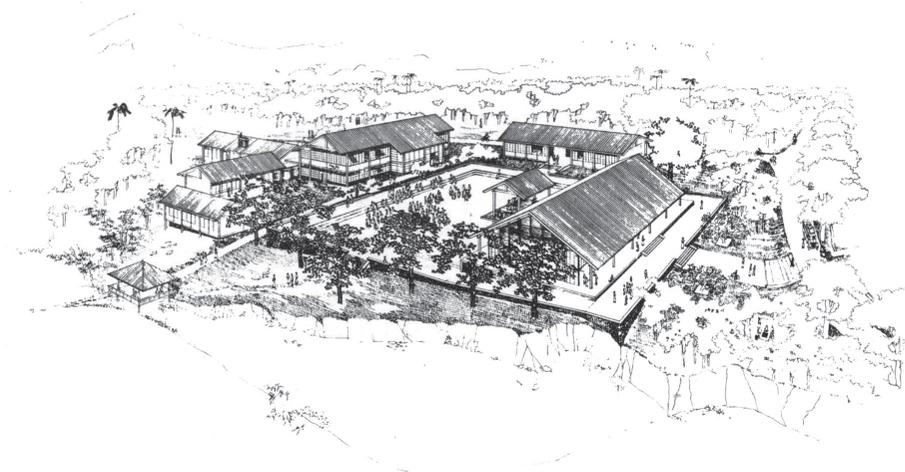


图4: 东海大学学生活动中心设计(陈其宽,1954—1956年间),采用不对称的院落群组,高低错落,融流动空间与园林精神,营造现代中国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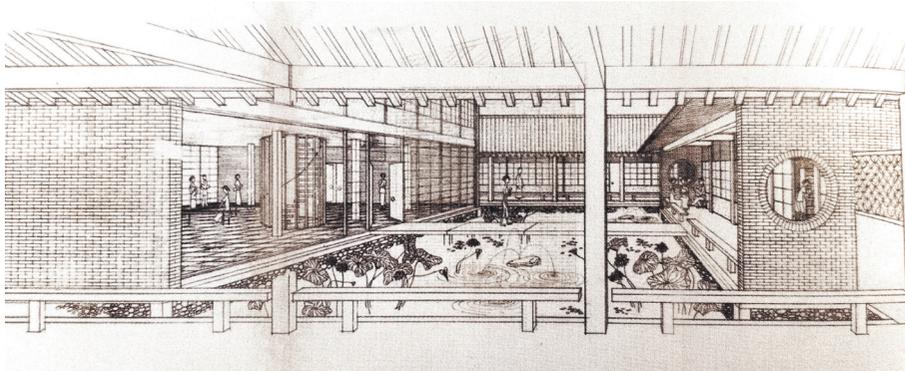


图5: 东海大学图书馆内庭设计(陈其宽,1954—1957年间),融合文人园林与流动空间精神于其中

亦即为中国传统之“宇宙观”,将经由人在空间中的活动产生的“四维时空体验”进一步引申、拓展至“人”与“环境”交流,直至“溶情与景”的“忘我”体验。在实践方面,台北市王大闳自宅、东海大学校舍等一系列取径中国庭院和园林、带有浓郁文人美学意蕴的现代中国建筑设计,则为理论发展提供了绝佳的体验场所(图3~图5)。流动空间概念逐步与文人美学之“移情”、山水画之散点透视原理和园林之“游”等具有“动态”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产生了积极联结拓展,在此过程中也促成了对文人园林现代价值的进一步发现。

1954年《今日建筑》上刊登了贝聿铭未建成的上海华东大学方案,以“利用水平发展,并以院子为中心的处理,打破了学院设计的惯例,显示出东方平和潇洒的气韵”形容其现代园林式空间,其后率先刊载东海大学设计方案,为师生提供了流动空间与中国建筑结合的设计范例。

省立工学院建筑系师生还参观了“兼两大师之长”^⑳、“糅合东方文化精神与生活情趣”的台北市王大闳自宅,描述了在曲折流线之中生成的如画空间,与沉醉于“月光竹影,皎月初升”之下的诗意感受^㉑。

1954年,金长铭在《建筑造型的新意义》中将流动空间解读为现代建筑“三度空间”加上时间后形成的“四度空间”,认为其层次更加丰富,并能将人的活动、情感和建筑环境融为一体,达到情景交融的至高意境。他写道:“如果在三度空间之外,再加上时间的因素时,则人类对建筑的美感不再是单纯的、主观的、由外向内的,不再是互相有距离的,也不是欣赏者与被欣赏者的关系,而是客观的、由内向外的空间互相间的组成,人与建筑糅合为一体的。这里渗透着时间的因素,交织着情趣与意念。”^㉒之后,他以王国维之“无我之境”“不隔”和克罗齐“物我合一”诠释这一使人“移情”从而“物我合一”的空间意境^㉓。他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

之境也……”“物我合一，即移情作用，将对象的物予以人性化，则物我不分……（物我合一的境界）为中国传统艺术上所以为依据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因之乃有物我合一的移情作用。”^{④2}在这位“精神上的中国现代主义者”看来，“流动”早已脱离了物理意义上的“移动”，是“互动”“灵动”直至情与景溶，成为遐思的无限拓展，与“心性自由”达成一致，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亦与“我与物俱往，而游心于物中”^{④3}之中国文学艺术精神有着共通的思想内涵。

这一将流动空间原则融合中国“动态”美学精神所衍生出的理论，构成了当时现代空间思想“精神化”“情感化”思潮的重要部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1950—60年代“动性结构优于静态结构”的“机动性”建筑价值取向的潜在影响^{④4⑤}，更使抽象的流动空间原理浸染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诗意盎然（图6~图8）。

1961年成功大学建筑系二年级学生刘以伸《自建筑精神价值谈中国现代建筑之方向》一文的相关论点，即体现了当时建筑界在现代建筑“形态机动”“空间流动”价值视角和中国建筑“虚实相涵”“可游”论直接影响下，对现代中国建筑的思考。

他写道：“（中国建筑的精髓）尽在‘涵实之虚’中。凡虚实相涵处，皆可引人入胜而为可游者。凡可游者，皆能涵入之精神，而‘藏焉息焉，休焉游焉’，进而真知其美之所在。既知美之所在，即与之合一，而忘其美之所在。这就是美感之极‘物我合一’与‘物我两忘’的境界。……中国住宅之深门重院，树木扶疏，堪人深入游息……中国公共建筑之游廊、曲桥、长亭及一路桃李垂杨、假山流水，更不似过道、高台、石梯、钢铁火柴匣……又如国画之虚白及视点转移法，游心于景物间，不同一般油画之涂满颜料及定点透视，中国古代女子衣服之飘带长袖长裙，不同西方之窄身紧口，中国毛笔之迴环运转、阴阳虚实，不同钢笔之生硬单调。如此种种，莫不说明以虚涵实在中国艺术上之微妙作用。”^{④6}

五、“中国建筑之精华”：明清文人园林在现代主义价值视角下的再发现及其思想内涵

如上文所言，1950年代以来院落、园林中的诸多文化要素已广泛运用于“新派”现代中国建筑设计理论与建构中，而在建筑史研究中，他们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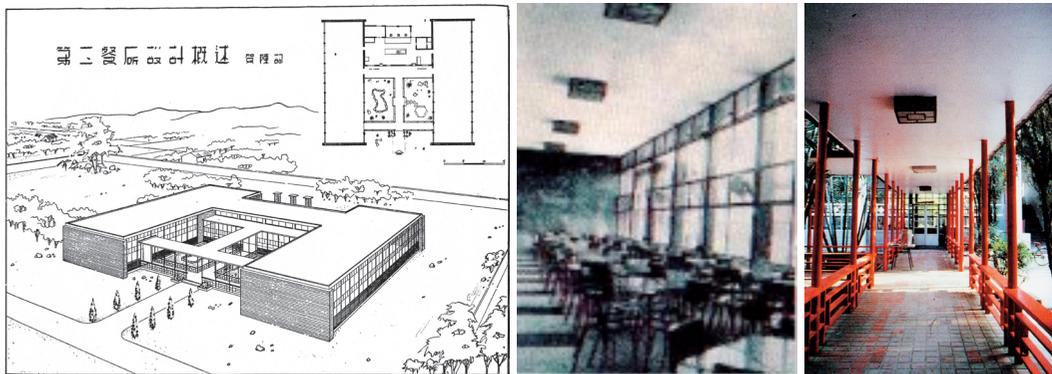


图6：成功大学第三餐厅设计（贺陈词，1958年），在简洁中式形态与庭院穿插中探索“游”的空间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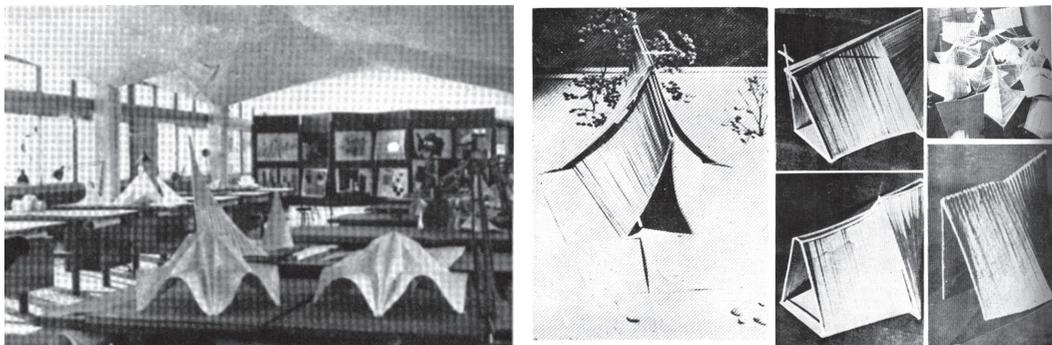


图7：陈其宽在东海大学建筑系对“动性”结构（即现代空间结构）的设计与教学探索（1961年），以及路思义教堂多方案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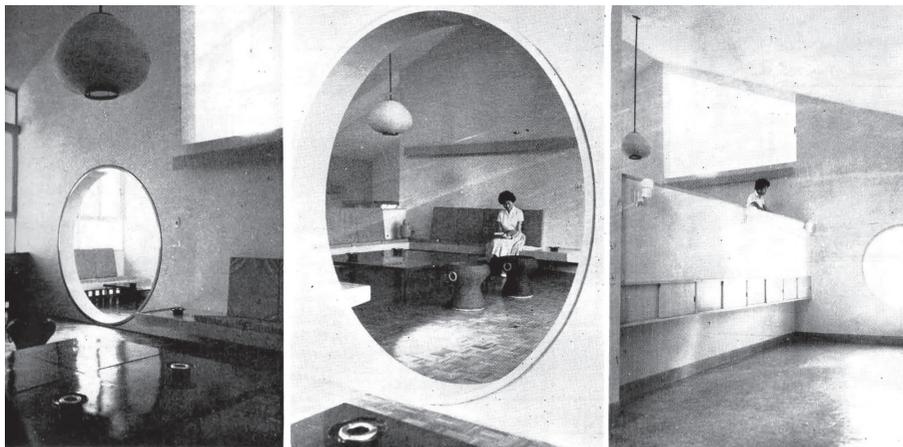


图8: 东海大学女职员宿舍(陈其宽, 1962年), 在移步换景的“游”与“留白”中抒发文人雅意

始认为以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为代表的、传统以来主导中国建筑史叙事主流的宫殿坛庙等官式建筑实为中国建筑诸多类型之一, 并且是应在现代社会“被淘汰”的类型, 并不能作为中国建筑的代表。在现代主义视角下, 文人园林的诸多价值也在与官式建筑的对比与对立中逐步得到普遍认知。

这一“扬庭园抑宫殿”价值体系的形成, 体现了1950年代后对中国建筑思想认知已逐渐由集权等级的礼制文化走向自由民主的人本文化, 既是中国文人传统中以人为本思想的反映, 亦可视为近代文化思潮余绪中自由主义、启蒙思潮的交叠映射。

1. 现代主义价值视角下园林价值的逐步再现

“园有异宜无成法, 不可得而传也”, 1955年王济昌^④引述《园冶》文字, 介绍了东西方“自然式与几何式”的差别, 认为中国园林“景象万千, 可以说是美的总汇”, 总结中国园林“既有静的美, 又有动的美”的主要特征, “或如诗画杨柳岸晓风残月, 或如战场千军万马声势俱壮”^④。

1961年贺陈词《中国庭园浅识》一文, 认为“熔铸绘画文学于一炉”的庭园(即园林)不同于“死去的宫殿式建筑”, 是中国建筑中“没有死而且是很有生命力”的一类。他总结了文人园林的主要优

点。其一, 具有“充足的实用性”; 其二, 文化意蕴浓郁, 可调节现代社会的紧张节奏, “举杯邀月的闲情, 柳岸残月, 小桥流水, 对于闹哄哄的功利社会是一副很可口的清凉剂……以另一种方式来培养大家对文学的兴趣, 对专业社会仍然是有很大帮助的”; 其三, 自然经由山水画而成庭园, 因而庭园亲近自然, 并高于自然, “中国的画向来以山水画为正宗, 文人对于大自然又特别亲切, 无疑山水画是画家对于景色观察体会的重视, 于是他们住宅里的庭园便自然地熔铸诗画风景于一炉, 很多画家创作了意境很高的庭园, 很多庭园的意匠就是来自山水画。中国诗画渊源流程, 其理论在世界艺术理论中另成体系, 中国庭园可以说是这个理论的具体表现, 所以它不是大自然的翻版, 而采择大自然的精妙重新组合”。该文基于现代建筑功能主义及文化性、有机建筑视角, 以优化促进现代建筑的出发点, 初步阐明了文人园林的现代价值。^④

1962年汪原洵^⑤《温故知新》一文, 认为因“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而形成了建筑多样性, “宫殿在我国建筑里, 其地位也仅不过占了一小部【分】……仅就宫殿这一小部【分】来说, 是不能以偏概全的。而且这些官式殿堂的做法, 倘使仅就其算例及则例来说, 也是非常枯燥乏味的”, 而与之相较, “庭园及点缀庭园之亭廊轩榭斋舫馆”则是“是全世界独特而美妙的建筑之一……无呆板规则可循, 贵

在变化无尽, 曲折有致, 虚中有实, 实中有虚……借景造形, 掩映生趣, 曲径通幽, 山路蜿蜒……皆需布置得体, 始能得相映益彰之妙”, “是今后最有希望发展的一项”, “因为我国庭园, 其好处在于变化……使作者思想领域扩张, 得以无拘无束安排, 从辽阔的天地中, 各运匠心, 无有雷同生厌之弊”^⑤。

1964年, 萧梅^⑥在《园林谈往》中批评了当时“食古不化的‘保存国粹’”和“全盘西化的‘创造’”同为“两种极坏的风气”, 她以“西方科学, 东方艺术”的架构阐述了融合比较西方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艺术的观点, “(西洋文化)尚智而拙意……为科学文化, 为求真之文化, 纳善于真当中”, “(中国文化)尚意而拙智……为艺术文化, 为求美之文化, 纳善于美当中”, “科学与美是国际性的, 故可由西方吸取来, 至于本国的文化、历史, 则要靠本国自己供给了……我国建筑之精华实在园林方面”。该文系统阐述了从周文王的宫苑至清代的园林历史发展, 将园林种类划分为“幽静深邃, 委曲婉转, 移形换景, 妙造自然”的江南私园与“雍容华贵, 开朗精雅”的皇家园林, 概括了“实中有虚, 虚中有实, 水面平阔, 楼台映掩, 花木扶疏, 曲径通幽, 景外有景, 园中有园”的中国园林特点, 重点介绍了北京勺园、故宫御花园、江南民间园林等明清园林。

概言之, 1950—1960年代, 取径园林精神而非官式建筑发展现代中国建筑已成“新派”的普遍共识, 园林和民居的现代价值、园林对世界的影响历史及对明清文人建筑价值的再思考, 也成为中国建筑历史研究中的新方向。^⑥

2. 人文主义与“扬庭园抑宫殿”思潮下对中国营造学社“架构制”的反思

1950年代以来, 在近代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下, 刘敦桢学生、建筑文化守成主义阵营代表人物黄宝瑜在台湾地区延续中国营造学社基于官

式建筑的“中国建筑进化论”学术观点，强化、联结礼制建筑与儒家道统、宗法制度，并在1960年代后成为大学教材与国民党“官方”推崇的中国建筑历史叙事⁵⁴。与之相对，1960年代初开始，“新派”在“扬庭园抑宫殿”的价值取向，对这一“官方思想”所依附的中国营造学社理论范式特别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架构制”进行了反思与批评。

1962年，汉宝德在《中国建筑的传统问题》中，将联结中国木构架与现代框架制度的“中国营造学社诸君子”视为“以西方现代的辉煌成就为根据，自我国旧传统中找出应合的项目”的“中国至上论者”，认为“中国建筑架构制”是民族主义下的“过分渲染”，无视木结构与钢筋混凝土结构在材料性能上的根本差异。他写道：“《营造则例》的绪论里有这样一段话：‘（现代建筑）应用的结构原则，却正与我们历来木造结构所本的原则符合，所以即使木料本身有遗憾，因木料所产生的中国结构制度的价值仍然存在，且这制度的设施，将继续地应用在新材料上，效劳于我国将来的建筑……’试看爱国的热情所造成的偏见，如果按这个说法，今天的钢骨与钢筋混【凝】土的结构方式，应是中国的固有传统……外国之使用此种结构纯然是新材料之弹性强度所致，我们对这一看法只能钦佩他们的一片苦心。”

同年，华昌宜在《仿古式建筑在台湾（上）》中，认为官式建筑之架构制是中国建筑的“束缚”，而非中国营造学社所认为的、与现代建筑共通的“空间解放”，他写道：“现代一般倡扬中国建筑者必定提及我国木构架制度和现代的钢构造、混凝土构造的骨架制度同理，仿佛我先哲早已超越前进，我国传统建筑早已现代化了。殊不知现代的骨架制度目的在使墙不承重后得与柱分离，而便于空间的自由分割；而我国传统建筑所有的隔间却是依柱准的，以至于形成如豆腐的空间，加以礼教的影响使格局对称而古板。骨架制度对我们传统建筑只有束缚之责而无解放空间之利。这一拿戈必意（Le Corbusier）或麦

斯（Mies van der Rohe）的平面和我们的建筑平面一比较，就知道那种得意的比拟是多么该羞愧。”⁵⁵

在同一文中，他赞誉园林是中国人最好的空间成就，并间接影响了西方现代建筑，但却为“中国固有式”设计者所漠视。他写道：“中国庭园空间深富曲折幽美之趣，此话确实不错，庭园空间虽是以以上我们所指狭窄的‘建筑’意义以外之空间，但确为中国人的最好空间成就，可惜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什么仿古式建筑加以应用（因为设计人的注意力全集中到屋顶上去），倒是经过日本人的手，转化以后，一部【分】被吸收到欧美的现代建筑里去，滋补了他人……”⁵⁶

由以上两节可见，经由中西多重思想脉络影响，1950—1960年代初期“新派”已形成了“空间自由优于结构束缚”“人文主义优于机械主义”之价值体系，这也构成其后续理论发展的思想底色。

3. 汉宝德“明清文人系建筑”概念的提出及其思想源流

作为深受金长铭、贺陈词等迁台建筑师影响的早期学生⁵⁷和“新派”中新生力量的领军人物，1971年汉宝德在《明清建筑二论》⁵⁸一书中总结了“明清文人系之建筑思想”。这一重要理论创新形成背后，有着1950年代以来“新派”理论建构中现代主义价值视角、人文主义精神、对“机械主义”的反动、“扬庭园抑宫殿”等多重思想脉络。

1957年至1960年代中期，在担任《百叶窗》《建筑》主编期间，汉宝德不惜余力地提倡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宣扬“建筑文化自觉”启蒙思想。⁵⁹1957年，他写道：“我认为新建筑最伟大的成就是把建筑从虚伪的艺术躯壳中解放出来，重新理解其复杂的人文因素。”

1961年，他在《回复蓝天同学的信》中将官式建筑视为中国建筑在新时代中应被舍弃的类型，“我国建筑的气氛是宫殿与庙宇的‘庄严’所表示不出来的。我国

民族成亿人口，有多少人是生活在宫殿与庙宇中的？……宫殿庙宇所表现的庞大比例与雕梁画栋的气氛，早已随手工艺时代帝政僧侣特权阶级消失而消失——它是应该被淘汰的”⁶⁰。

1962年，他在《中国建筑的传统问题》中肯定了中国园林与现代主义的共通及其蕴含的文人精神与人文价值，“我们的传统维护者胆敢提出庭园设计向西方挑战，实在是现代建筑有关观念的影响则促成。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中国园林确是拥有普遍性与永恒性，自然式的计划与现代艺术理论不谋而合，恰足表示传统中的真正价值不会沦落。……然则我们庭园特色除‘自然’的原则为西方所霸占外⁶¹，有没有其他内容？有的，那是自六朝以来中国文学界所逐渐建立的世外思想，加上宋元词曲家所传承的‘花间式’绮想”⁶²。

同年，他在《建筑国际运动的再认识》中，分析了CIAM的瓦解，认为人文主义将重新崛起，“举世思想界逐渐恢复到个性的发挥与区域风格的建立等富浪漫情调的新趋势里”，对盛期现代主义所仰仗的“机械至上”理论的反动是一种历史必然，“本世纪之初，欧洲各国在机械至上的观念下，实际是机械地分析了人生……新的功能观念来自机械，新的审美律则来自机械……可是机械非文化之全部，当其过分被放任造成支配社会之主要因素时，反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⁶³

1963年，他在《新建筑反人文主义性格》中表达了对经典现代主义之“机械主义”反人文主义的反思，并认为“当这种思想（机械主义）为欧美的大本营遗弃以后，遂见于东方与南美等对机械极端渴望之地区，是值得注意的”⁶⁴。同年，他在《从结构与形式看我国建筑斗拱之演变》一文中，以人文主义的视角，对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基于“机械主义”，即“【借】着结构力学的知识”所得出的“明清建筑衰退论”提出质疑，认为“旧有的物质主义的史观对我国建筑史说的束缚必须予以解除。自此解脱，我们方看出一些新观察角度的可能性”⁶⁵。现代建筑运动后期修

正思潮中对现代建筑“机械主义”的反动与对人文精神的提倡,形成了该时期汉宝德推崇文人园林,并质疑中国营造学社依据“机械主义”之“中国建筑进化论”的重要影响源。

1971年汉宝德在《明清建筑二论》⁶⁶一书总结了“明清文人系之建筑思想”,在中国建筑界率先提出“文人系建筑”概念,以“平凡与淡雅”“简单与实用”“整体环境观念”,分别从建构、功能和环境3个方面阐明了中国文人建筑的现代性⁶⁷,与此同时,其试图“跳出结构至上主义者的圈套”,对梁思成基于官式建筑所构筑的“明清建筑低潮期”观点进行反思。

汉宝德的这一重要理论创新是“扬庭园抑宫殿”思潮的思想体现,是1950年代以来“新派”以现代主义视角对明清文人园林价值再发现的叙事延伸,是汉宝德在人文主义框架下对1960年代以来个人系列中国建筑史学思考的系统总结,同时亦隐含了对当时文化保守主义影响和国民党意识形态下以儒家道统和官式建筑为主导的“官方”主流中国建筑历史叙事的批判。

六、结语:现代建筑空间思想与道家哲学、文人美学在现代中国建筑“空间”层面的跨文化融合与升华

综上所述,1950—1960年代中前期,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通过融合现代建筑原则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相关建筑实践,与现代主义价值视角下对明清文人园林的再发现相辅相成,形成了系统中国化空间理论体系,构成了现代中国建筑之“空间”理论板块。具有如下特征与意义。

其一,近代中国现代建筑脉络在世界现代建筑思潮中的理论续篇。

台湾“新派”建筑师群体的理论探索,是1930年代以来现代中国建筑思想新芽之后续发展。他们融合我国港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在建筑、文艺界的相关理论成果,基于空间与流动空间两个现代建筑核

心原则,联结广义的中国文化艺术传统进行了深度理论融合,使现代建筑抽象原理得到中国化与意义升华,为现代中国建筑设计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发展导向,在台湾地区续写了关于现代中国建筑之“意”的理论篇章。这一历史叙事充实、完善了1950年代后中国建筑界在现代建筑空间范畴的发展图景⁶⁸,具有重要历史与学科价值。

其二,浓郁的跨文化特征,文人色彩与现代建筑抽象概念的中国化发展。

“新派”建筑师普遍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理论建构跨文化色彩强烈。他们联结中国道家哲学、传统文学、文人美学的相关要素,充分运用了联想、引申、拟人等中国传统文学手法和老庄哲学朴素的二元辩证法,采用中国传统“比”和“虚实结合”等文学修辞的方式,将现代建筑概念与生成原则中国化、多义化、人性化,赋予其多重语意和丰富的中国文化色彩,终令现代空间与文人雅意交融一体,饱含诗情,融于画境,在悠游吟咏之间步入心灵,使空间思想成为兼具解读、提升中国传统建筑价值与形塑、发展现代中国建筑的核心理论工具。我国台湾地区后续不少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浓郁的建筑理论,均可在此找出影响或来源。

其三,现代视角下对明清文人建筑的价值发现。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脉络的重要组成⁶⁹。

“新派”建筑师通过现代主义及其后期修正思潮的价值视角,对明清文人园林之空间与艺术价值进行了重新发现和肯定,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长久以来中国建筑历史研究中主要聚焦于宫殿坛庙等官式建筑的传统视角,赋予了通常在传统建筑史论述中被认为“衰退”的明清建筑以新价值、新意义,创新提出“文人系建筑”概念。这一理论动向,拓展了中国建筑研究的视野,促进了对园林和民居建筑的进一步研究,充实了1950—70年代中国建筑学界的研究版图,为现代中国建筑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传统要素来源。

文末,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回向

1930年代初,那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开始以现代视角审视古老中国传统并探求未来中国建筑道路的时刻。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林徽因概括了中国建筑“均衡相称”与“曲折变换”之“两种极端相反布置”⁷⁰,对中国建筑之“庄严”与“浪漫”两类不同特征的关注亦形成了早期现代中国建筑探索的两个面向,“如果说以梁刘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研究者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以宫殿和寺庙为代表的官式建筑和它们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建筑法式,那么童寓则在中国现代建筑家中最先发现了古典园林所体现的中国文人建筑的美学追求”⁷¹。而作为这一思潮的渡海延伸,1950年代后,如果说以卢毓骏、黄宝瑜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秉持了官式建筑传统与儒家典章制度的华夏煌煌威仪,用于近世“秦汉风范,隋唐规模”的文化再造,那么以金长铭、贝聿铭、陈其宽、贺陈词、汉宝德等为代表的“新派”,则提点着性灵、雅致、超旷的诗意之烛,在传统园林、文人美学和老庄哲理的通幽曲径上微光徐行,寻求心灵自由与思想启蒙。

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脉络的重要支流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余韵的建筑映射,大陆迁台建筑师和他们有志于传承发展中国建筑文化的后继者在台湾地区留下的文字与思想,拓展了现代中国建筑所承载的价值与意义,成为1950年代后现代中国建筑理论书写的重要篇章。今日将台湾地区“新派”纳入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脉络与中国近代思想脉络框架整体考察,将有助呈现1950—60年代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发展的多元图景,补充战后中国建筑界在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程中的叙事,亦是台湾近现代建筑叙事纳入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宏大叙事共同书写的步骤之一。

[致谢:本文成文过程中,台湾地区铭传大学徐明松教授与许华山、刘文杰等建筑师以及厦门大学张燕来教授提供了资料协助,匿名评审专家提供了宝贵意见,吉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硕士研究生杨果、宋雨璇参与文献发掘整理,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注释

① 现代建筑存在广义与狭义范畴。本文研究中所涉及的现代主义主流思潮主要涵盖以包豪斯学派和建筑四大师为代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熟的现代建筑及其理论体系，和以吉迪恩《时间·空间·建筑》为代表的现代空间理论，战后至196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受到一定的修正，这一阶段一般被视为现代建筑运动中晚期，亦属于本文研究时间范畴之中。现代建筑的基本观点主要有强调功能，提倡“形式服从功能”；提倡结构理性，建筑形体体现新材料、结构和工业化施工的特点；摒弃烦琐装饰，体现简洁明快的建筑审美，强调空间及与周边环境的结合，流动空间论、有机建筑论、开放布局都是具体表现。同样，对“现代中国建筑”的定义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研究范畴内之“新派”现代中国建筑，其性质大体上等同于彭怒所定义的“中国本土性现代建筑”，即融合（区别于学院派的）现代建筑思想与（区别于官式建筑的）中国园林、民居的现代中国建筑类型。综合自罗小未《外国近现代建筑历史》、刘先觉《现代建筑理论》、《中国近代建筑史（五卷本）》及李海清《从“中国”+“现代”到“现代”@“中国”：关于王澍获普利兹克奖与中国本土性现代建筑的讨论》等文献。

② 关于卢毓骏、黄宝瑜的理论建构可详见：黄庄巍，邹广天，从结构理性到儒家文明——卢毓骏和他的理论建构与延续[J]. 建筑师，2021(01): 123-131；黄庄巍，邹广天，刘静，学社余韵，返本开新——黄宝瑜和他的中国建筑史学书写与理论探索[J]. 建筑师，2021(05): 123-131.26-38.

③ 历史背景和“新派”建筑师介绍、相关建筑活动详见：黄庄巍，刘静，邹广天，现代中国建筑之“脉”的分枝与演进——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群体研究[J]. 建筑师，2023(02): 56-74.

④ 参见：Anthony Alofsin. The struggle for modernism: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The City Planning at Harvard[M]. W.W.Norton and Company, 2002: 24.

⑤ 参见：Henry—Russell Hitchcock, Philip Johnson. International Style, Architecture Since 1922[M]. W.W.Norton and Company, 1997: 154.

⑥ 参见：罗小未，外国近现代建筑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63.

⑦ 赖特对老子哲学和道家十分推崇，塔里埃森墙壁刻有老子言论“the reality building is not consist on roof and walls but in the space within to be live in——LaoTse”（“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的意译），并在当时引起了中国建筑师的注意。据师从赖特的汪坦回忆，“在西塔里埃森学习时，赖特时常让我们阅读老子《道德经》，并常用十一章中的语句来阐明他的空间概念”；梁思成1947年拜访塔里埃森时，赖特与其探讨了老子的空间哲学，并希望他将广亩城市理念带回中国。参见：汪坦，1948生活在赖特身边[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崔婉怡，许懋彦，梁思成以“形体环境”理念为核心的现代建筑教育思想形成与实践探析[J]. 建筑师，2021(05): 39-52.

⑧ 张一调(Amos Ih Tiao Chang)，广东人，1939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赴美，分别于1949

年与195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建筑系硕士与博士学位，后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1952年至泰国曼谷作为建筑师执业，1967年返美任教于堪萨斯州立大学，持续研究中西建筑精神的融合，著有*The Existence of Intangible Content in Architectonic Form Based Upon The Practicality of LaoTzu's Philosophy, The Tao of Architecture*，1990年代初在《建筑学报》发表《中学为神西学为用：建筑设计的节奏》《黄帝万亭陵设计构想》。

⑨ 1956年张一调将其博士论文整理为英文著作*The Existence of Intangible Content in Architectonic Form Based Upon The Practicality of LaoTzu's Philosophy*（《从老子哲学的实践性看建筑形式中无形内容的存在》）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著理论建构中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有如下几个主要论点。第一，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他认为，欲知老子之变换观念，通常必须于“有”与“无”二方面互加参考，而不能仅靠具体的表层说明。……在任何情况下，根据相对观点的看法，某事物所谓正的，仅只是因袭传统或特殊意欲而易于强调与说明而已；如果“白”被称作正面的而称“黑”为“反面”，这同样当“黑”的，在另一个观点看来，“白”的乃可称之为“反面”的；更进而言之，据其所显示的程度，我们可说可触知的，具体的一面是此事物“正”的一面；相反，不可知的一面是事物“反”的一面，这个次序也可以倒过来说。……每个个体均有其不足之处，“负的”与“非具体”的事物亦不例外，事物中不具体的“特性”虽难以具体说明，但我们可认为其是“实在”的。（空间）在老子的论题中，被称为“无状之状”或“无物之象”。他认为老子的思想中存在着“有”与“无”一对对立统一并可相互转换的要素，老子关于“变”的思想，可解释为“有”与“无”对立并可相互转换的状态，“空”这一要素以其“无形性”赋予进一步发展的无限可能。第二，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张认为，“非物质”的常常被忽视的，但是最有用的。空的惯常被认作是负的，实际上它更为重要，因它能容纳存在的实体……建筑的构成都基于时间的因素即生理的机能与心理的经验两方面，把“时间”作为有机性的主要因素，建筑故可解释为“人类生活与时间经验之空间表现”；第三，大象无形。他认为，不论从微观或宏观角度，自然界中生长着的、活的部分被看作是由不规则的但灵活地由“空”结合起来的无限要素组合而成的。……在处理有形物体时，建筑师通过实体的形式来设想无形的部分……老子关于形式的观点与“空”（Emptiness）和“无物”（Non—existence）存在强关联，“无”是一种持续存在，空间相较于实体可不受束缚地相互渗透，并具有无数变化的可能。第四，大方无隅。他认为，一个环境只有当人们意识到其有形的范围或者体会到其视界时，方能清楚地认识它。……人类运动和生长所形成的轮廓是一个空间的弹性体，没有任何具体形式能够准确地说明它。我们赖以生活的空间弹性体不是实在的物体，但确实存在。……“无”的状态任何时候都是无限的，而且很有用处。……空间的弹性通过限定的和有限范围的界限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并需考虑处于单个环境中的人的因素。……导向空间中的流动感主要通过记忆的概念联系性中两个连

续不断的环境之间的开放性之对比产生，这种流动感又为与流动方向一致的实体所引导。开放环境具有更多余地供身体和光的运动并吸引更多注意力，狭窄环境则将产生拥堵的感观，并加速向前的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中，实体引导似乎更明确了流动的方向，但仍起到周边空间中两个隔开或相互渗透体积之间在韵律上的纽带作用。

1950年代初期，张一调的论文流传至台湾地区，根据华昌宜回忆，当时系上的金长铭等人持有该论文，在该系教学和理论文章中可以看到受到这一联系道家哲学与现代空间思想理论体系的烙印。而在金长铭赴美后的1961年的硕士论文《东方艺术博物馆设计》中对道家空间观的描述，也可见这一理论影响的发展。金长铭在该文中对“形式与空间”的关系有如下主要论点：建筑是一种形式和空间（的组合），形式和空间只能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而不能单独存在。建筑不仅是形式与空间，它使它们相互统一，同时高于它们。形式是过去的建筑，而空间是革命的建筑，是现代建筑的开始，形式与空间的集成……空间是真实的，是一种感官体验的真实。它如同现实一般，是个人的感官体验；它如同物质一般，是一种表达方式……一旦在本质上对它获得了解，那么就可以按其自身的规律去掌握它，并根据这些规律对它进行排列……人们必须有机会在建筑中体验空间，通过建筑，我们可以意识到从虚无到现实的空间感知。真正的建筑概念，超越所有功能的融合，是从形式上进行空间的创造。空间作为建筑师的一种原材料，类似于雕塑家的一种固体材料……建筑是一个空间雕塑，自由而美丽。

以上笔者翻译自张一调1956年*The Existence of Intangible Content in Architectonic Form Based Upon The Practicality of LaoTzu's Philosophy*和金长铭1961年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硕士论文《东方艺术博物馆设计》，1962年《百叶窗》中郑文雄译张文《基于老子哲学的应用看建筑形态的玄奥内涵》《在建筑视域中自然的生命律动》及1980年代吕祖谦译张文《道与建筑》亦提供一定参考。

⑩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中国现代著名思想界、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江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49年赴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1958年与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勱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51年出版《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对中国艺术精神主体层面、中西艺术精神比较等进行了论述，对1950年代港台文艺界影响广泛。

⑪ 1951年，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建筑”一节主要有如下相关论点，“中国文学艺术之精神，其异于西洋文学艺术之精神者，即在中国文学艺术之供人可游。……凡可游者，必待人精神真入其乎，而藏焉、息焉、修焉、游焉，乃真知其美所在。即之其美所在，即与之合一，而忘其美之所在，非只供人之外欣赏，于其加以赞叹崇拜而止也。故西方高耸云霄之教堂，使人入其中者，可仰望而叹其高卓，然人不能游于其顶下之半空，是高卓而不可游也。……中国之宫殿，未尝无上达霄汉者，然高达必求宽阔，如阿房宫、未央宫、建章宫之千门万户，四通八达，

则建筑之伟大而可游也。……中国古之人家多重门深院，‘庭院深深深几许，帘幕无重数’，则堪人之息游。西洋之洋房，恒重高达，缺平顺与深曲。……然洋房有卧室、客厅、书房，而无堂屋，洋房多瓦与墙齐，无檐下；有过道而无回廊……中国之堂屋，与其中之神位，则庄严家庭而神圣化之，以融文化生活之精神于私生活之中，纳高远而卑近，其义深矣。至于中国房屋之有檐下之回廊，亦所以使人之精神随处有藏修息游之地。夫瓦与墙齐，则内外自成界限；有檐下之空间，则虚实相涵，内外相通，徘徊檐下，漫步回廊，皆所以息游。……飞檐飞角之飘逸，宛若与虚空同流，亭子聚集四面八方之风景，故杜工部有‘乾坤一草亭’之句。而楼阙使两方行人相望，牌坊壁立途中，使两头之风景，交流聚合，亦皆以其能以虚涵实，而通内外。然凡虚实相涵之处，皆心灵可优游往来之处。而此中美感之所自生，亦即在此心之无所障碍，玲珑自在，以优游往来。故谓中国建筑之美，在其表达一可游精神。斯宾格勒于《西方之衰落》中，曾称道中国园林之取径回环，花木幽深，较西式公园之便于游息，而未真知此乃遍于中国建筑之精神也。”参见：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台北：正中书局，1953：222-224。

贺陈词即深受此论影响，1960年代末期，其远渡英伦，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室钻研史料，写成长文《中国建筑以及庭园艺术远播欧西的史实探讨及对欧西的影响》，文中即基于唐君毅对中国园林的观点展开论述，“中国之艺术精神在可游，亦可改谓中国之艺术精神在虚实相涵”，并在诸多1960年代后的现代中国作品中以回廊、庭院体现“游”的空间流线。

⑫参见：大师小传：弗兰克·罗·赖特[J]。今日建筑，1954(7)：6-12。

⑬参见：大师小传：麦斯·凡·德·罗[J]。今日建筑，1954(05)：22-23。

⑭参见：陈其宽·贡献一砖[J]。建筑(台中)，1963(3)：21-24。

⑮参见：金长铭·建筑造型新意义[J]。今日建筑，1954(05)：2。

⑯联系金长铭对学院派和现代建筑的态度，其将两种中国武学流派与建筑设计方法的类比隐含如下思想，即学院派式的、注重外形的设计方法是“刚性的”“可见的”，类似于少林武术的“硬派”的特征，而构成现代建筑核心的空间设计方法则是“柔性的”“不可见”的，类似于太极的“以柔克刚”“制敌于无形之间”，更为高明。参见：金长铭·建筑造型新意义[J]。今日建筑，1954(05)：2。

⑰参见：陈其宽·贡献一砖[J]。建筑，1963(3)：21-24。

⑱参见：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台北：正中书局，1953：226。

⑲参见：贺陈词·中国庭园浅识[J]。百叶窗，1962(2)：6。

⑳刘国松(1932—)，山东青州人，著名现代中国水墨画家。1956年自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创立五月画会，推动现代艺术运动，随后倡导“中国画的现代化”，提出“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与“毛笔的命，革中锋的命”的鲜明主张。其1950年代曾在油画中加入水墨趣味以进行现代中国画探索，1961年后受

当时“新派”对钢筋混凝土仿古建筑的批评影响，受结构理性主义“使用一种材料，一定要把这种材料的特性发挥到最高境界。不能用这种材料去模仿、代替另一种材料的特性，否则就是作假”启发，从而放弃油彩与画布，重回纸墨世界。

㉑参见：刘国松·试论写意画的发展[J]。百叶窗，1961(2)：6。

㉒《易经·系辞》。

㉓以上引语中的论点散见于金长铭、贺陈词等在1954—1961年间的相关论述。

㉔参见：刘以伸·梁异·建筑问题应答[J]。百叶窗，1959(2)：5。

㉕参见：金长铭·东方艺术博物馆设计[D]。弗吉尼亚理工学院，1961。

㉖1950年代初期，大量现代建筑倾向于盒子式的简单外形和光墙大窗，现代建筑大师在建筑创作上所具有的鲜明个性特色经过长期沿用和各地相互转抄，已逐步成为千篇一律的教条，“方盒子”式的建筑大同小异，缺乏艺术个性，逐步走向形式主义，这一现象引发了国际建筑界的反思潮流。参见：刘先觉编·现代建筑理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1。

㉗这一为现代建筑注入“中国精神”的思潮与1950年代中期后现代建筑运动的新动向紧密相连。1956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第十次会议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召开，一群筹备会议的青年建筑师如巴凯马(Bakema)等人公开对国际式建筑提出宣战，宣称“反对机器秩序”的概念，要注重建筑的“精神功能”，强调“今天新精神的存在”等，造成了CIAM内部新老两派的意见分歧。1959年第十一次会议在荷兰奥特洛(Otterlo)召开，矛盾进一步激化，最后导致CIAM宣告解散。参见上注。

㉘代表的如1954年《今日建筑》翻译彼得·贝鲁奇《新建筑的精神》写道：“由于科学的日益进步，促进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曾使旧的美感视觉语言和新的物质精神之间陷于一种无法谐调的尴尬境地而正日趋没落中。我们的天才创造者们，正试求在一个新世界中，去创造新的美感视觉语言，用以重调和精神物质的对峙，在我们社会中，因为生活的现实需要，产生了大量的公文撰拟者、演说者和为生活奔波劳碌的旅行者。我们太缺乏诗人、歌唱家和拓荒者了。为了使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用调和，我们之极需诗人和我们之需要公文的撰拟人同其殷切；我们之需要拓荒者和我们之需要旅行者亦同其殷切；我们之极需歌者与说客之殷切也无二致。”

㉙参见：刘以伸·自建筑精神价值谈中国现代建筑之方向[J]。百叶窗，1961(3)：14-16。

㉚参见：吉迪恩著·方汝镇译·地域建筑——现代建筑管窥[J]。今日建筑，1954(3)：4。

㉛参见：林空·中国建筑文化略论[J]。今日建筑，1954(11)：26-28。

㉜建筑沙漠是1950—60年代“新派”对于台湾地区社会普遍在“道器之辨”的传统观念中将建筑视为土木工程、各界不重视建筑文化、知识界不认识建筑文化性与重要性的说法，这种情况为这些文人建筑师所难以忍受，成为呼唤“建筑文化自觉”的重要背景。代表的如汉宝德“建筑不但失却其文化发展上的机能，而且使社会的实质结构变成枯干的，难以忍受的人造沙漠”。贺陈词在《从建筑沙漠中谈起》一文中，

总结了建筑文化在中国的被忽视和误解的原因，颇具代表性，“中国的建筑从来就是匠人的事，不能跻身学问之林。传统心理也不允许士人去学匠人的事。这样，建筑就必然不受重视。……导致国人对建筑的错误观念，以为建筑与土木无殊。使建筑文化在中国完全虚掷了光阴，到头来缴的还是一张白卷。所以中国的建筑完全是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形，勉强未夭折而已。根本没有受到应得的扶持。难怪它要萎靡不振了。惟其没有受到应得的扶持，惟其不振，建筑的观念在国人甚至在建筑师的心目中愈来愈模糊。愈搞不清建筑在文化领域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负的使命”。参见：贺陈词·从建筑沙漠谈起[J]。建筑，1963(6)：7。

㉝吉迪恩认为“立体派画家所探究出来的表现空间关系的方法，促使新的空间观念的形成”“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三维空间——加上第四维——即时间的向度”，希格弗莱德·吉迪恩·空间·时间·建筑——一个新传统的成长[M]。王锦堂，孙全文，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300。

㉞参见：黄作燊·卢永毅，译·论中国建筑(1948)[M]//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编·黄作燊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17-18。

㉟同上注：17-21。

㊱典型的如《建筑讲话》，以延续性为主题，阐明了时间、运动与建筑不可分割的概念。参见：王绰译·拉斯金(Eugene Raskin)·建筑讲话[J]。百叶窗，1959(2)：6-7。

㊲即密斯与格罗皮乌斯，该文介绍王大闳“氏虽出自Gropius门下，然其个人对Mies Van Der Rohe之爱好尤深”。

㊳《今日建筑》对王大闳自宅的描写文字充满了曲折空间中的诗情画意。作者写道：“一面高高的普通红砖围墙，和两扇未经油漆的狭长院门，虽然你是专程去拜访的，但若不注意看清门牌，你决不会想到这里会有什么奇迹。敲开门进去，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个中国式的自然庭园，里面放着一栋简洁而精致的房屋。驻足片刻，视线通过稀疏的树木，以及向南的一排自地而直达天花的长窗，你已为室内外的情调摄住。这时一条石板铺砌的小径引入入室。进门是8寸宽的朱红壁橱，右转便是宽敞的起居室……另一侧是一只长的靠榻，上面放着色古香的垫子和枕头，再配合天花上悬下来的大葫芦，充分流露出东方的情调。起居室一端通卧室，一进卧室最动人的是东向5½寸直径的大圆窗，窗外种着几枝清竹，圆窗窗扇故装墙外，以使墙面能充分洞开，伸手可触及自然，此时圆窗在感觉上只是画面重要一环，将室外景物很微妙地引入室内。试想在清晨或月夜静卧床上，透过圆窗，或闻鸟语花香，或见月光竹影，其情其景，岂天上独有！……花园里围墙上的圆形壁灯，透过树梢放出光芒，恰如皎月初升，尤令人神往。”参见：介绍王大闳先生的住宅[J]。今日建筑，1954(5)：17-21。

㊴王大闳现代中国式自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许多日后知名建筑师在学生时期接受“洗礼”的地方。高尔潘曾提到，看到这栋房子让他激动得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而李祖原曾回忆，大学时同学若能够去参观王大闳的家，就如同穆斯林能去朝拜麦加一般。参见：徐明松等·粗犷与诗意——台湾战后第一代建筑[M]。台北：木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

㊵参见：金长铭·建筑造型新意义[J]。今日建筑，

1954 (5): 2.

④参见: 金长铭. 才与圣 [J]. 百叶窗, 1959 (2): 6.

⑤同上注。

⑥参见: 唐君毅.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M]. 台北: 正中书局, 1953.

⑦参见: 金长铭. 空间结构的观念及其可能性 [J]. 今日建筑, 1954 (2): 11.

⑧战后随着新材料、结构技术的发展, 在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中, 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内在特征的现代空间结构成为建筑先进性的表征, 对“机动性结构”和现代空间结构的探索成为热潮, 同时在流动空间观的影响下, “动态结构”优于“静态结构”成为当时台湾地区建筑界普遍认同的观点, 包括“新派”和卢毓骏均受到一价值体系的深刻影响。详细讨论可参见: 黄庄巍, 邹广天. 从结构理性到儒家文明——卢毓骏和他的理论建构与延续 [J]. 建筑师, 2021 (01): 123-131; 黄庄巍, 刘静, 邹广天. 现代空间结构的集体呈现及其中国化表达——1960年代台湾地区建筑探索 [J]. 新建筑, 2020 (04): 112-117.

⑨参见: 刘以伸. 自建筑精神价值谈中国现代建筑之方向 [J]. 百叶窗, 1961 (3): 14-16. 这一论点源自唐君毅《中国文化艺术之精神价值》中建筑、书画一章, 唐君毅写道:“(中国古代女子)长袖善舞, 长裙曳地, 身游于衣中……吾为此言, 亦所以喻中国艺术中所崇尚之优美之极致, 在能尽飘带精神, 及优游回环、虚实相生之妙, 而亦可通于壮美。此除可由中国之建筑取证外, 兼可由中国之书法、绘画、音乐等证之。”参见: 唐君毅.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M]. 台北: 正中书局, 1953.

⑩王济昌(1917—?), 大陆迁台建筑师, 河北人。194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建筑系, 赴台后开办王济昌建筑师事务所, 后任成功大学建筑系教授(其中1965—1974年任系主任)。1976—1987年创立逢甲大学都市计划系并担任系主任。

⑪参见: 王济昌. 漫谈造园 [J]. 今日建筑, 1955 (8): 54-53.

⑫参见: 贺陈词. 中国庭园浅议 [J]. 百叶窗, 1962 (2): 6-7.

⑬汪原洵(1916—?), 大陆迁台建筑师, 江苏吴县人。1939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 后赴台工作, 曾任逢甲大学建筑系主任及中原大学建筑系教授。

⑭参见: 汪原洵. 温故知新 [J]. 百叶窗, 1962 (3): 1-2.

⑮萧梅(1936—), 广东中山人, 台湾地区当代知名建筑学者, 为中国近代著名音乐家萧友梅侄女。1960年成功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在基泰工程司任建筑师, 后于东海大学建筑系、台北科技大学建筑系任教。1968年著有《台湾民居建筑的传统风格》, 该书为战后最早研究台湾民居的重要成果。

⑯具代表性的还有贺陈词1970年代后赴英国收集海外资料, 发表的《中国建筑与庭园艺术远播欧西的史实探讨及其对欧西的影响》《东西建筑与庭园焊接问题》等论文。

⑰通过2014年赖德霖教授对汉宝德进行的采访可以得知, 汉先生回忆“当时台湾的中国建筑史老师把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当菩萨, 用的材料是他们的著作或听他们课的笔记”。而在“新派”批判官式建筑、推崇文人园林的根本价值取向, 1971年汉宝德《明清建筑二论》一书批评以中国营造学社的中国建筑史研

究关注古代官式建筑, 认为明清时代以江南地区建筑为代表的中国文人建筑在环境、功能、空间和材料方面都有突出成就, 真正体现了中国建筑在设计原理方面的发展, 汉宝德的这一论调则被尊崇并延续中国营造学社观点的黄宝瑜批评为“标新立异”。综合自: 赖德霖. 汉宝德先生与《明、清建筑二论》——一份访谈笔记 [J]. 建筑学报, 2014 (12); 黄庄巍, 邹广天, 刘静. 学社余韵, 返本开新——黄宝瑜和他的中国建筑史学书写与理论探索 [J]. 建筑师, 2021 (05): 123-131.26-38.

⑱华昌宜. 仿古式建筑在台湾(上) [J]. 建筑(台中), 1962 (4): 10-15.

⑲同上注。

⑳在汉宝德的回忆中, 金长铭和贺陈词是对其影响最大的两位教师。“那时对一个学建筑的学生而言, 很难想象以后是靠建筑来追求名利, 因此许多老师如金长铭老师便把建筑当作一种文化事业, 以宗教献身的理想从事建筑教育, 因此我对于建筑也是抱着一种宗教献身的学习, 使我深深感受到成大建筑系那段艰苦的日子, 才是令人怀念的。”“在此一生中, 贺先生是影响我最大, 而又不能具体地指出影响何在的老师。……在贺先生的小客厅里, 对着于右任的一幅小直轴, 天南地北, 无所不谈。贺先生对建筑十分执着, 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 为人谦和, 不以老师自居, 所以我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接受他的影响……, 他是我的精神支柱。”参见: 汉宝德. 筑人间——汉宝德回忆录 [M]. 台北: 天下远见出版社, 2004; 汉宝德. 大乘的建筑观 [A]// 东海大学建筑系编. 贺陈词教授七十秩寿庆论文集. 1990.

㉑该书由两部分组成, 其“二论”分别为明清文人系之建筑思想与明清建筑的形式主义精神。参见: 汉宝德. 明清建筑二论 [M]. 台北: 镜与像出版社, 1972.

㉒参见: 黄庄巍, 刘静, 邹广天. 现代中国建筑之“脉”的分支与演进——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群体研究 [J]. 建筑师, 2023 (02): 56-74.

㉓参见: 汉宝德. 回复蓝天同学信 [J]. 百叶窗, 1961 (1): 6.

㉔根据上下文, 其所指的是中国园林对英国园林的历史影响和对现代园林的影响。

㉕参见: 汉宝德. 中国建筑的传统问题 [J]. 建筑(台中), 1962 (4): 2-8.

㉖参见: 汉宝德. 建筑国际运动的再认识 [J]. 建筑(台中), 1963 (5): 5-7.

㉗参见: 汉宝德. 新建筑反人文主义性格 [J]. 建筑, 1963 (7): 10-12.

㉘该文中, 汉宝德在“中国建筑大木发展的一般看法及其缺陷”一节中, 对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工作进行了肯定, 但基于人文主义对其“明清建筑衰退论”的理论依据和结论进行了系统反思, 提出应从“新角度”进行再发现。参见: 汉宝德. 从结构与形式看我国建筑斗拱之演变 [J]. 建筑(台中), 1962 (8): 6-12.

㉙参见: 汉宝德. 明清建筑二论 [M]. 台北: 镜与像出版社, 1972.

㉚参见: 赖德霖. 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与发展之路上的王澍 [J]. 建筑学报, 2012 (05): 1-5.

㉛1949年后, 在东西方阵营对立的历史情境下, “流动空间”理论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产物在大陆受到批判, 中国大陆建筑界对“空间”发展主要转向了深受

苏联影响、与学院派结合的“空间构图”, 期间有个别的设计尝试和“空间原理”设计方法探索, 如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冯纪忠在同济大学的“建筑空间组合设计原理”等, 形成了不同的发展形态。参见: 闵晶, 卢永毅. 中国现代建筑“空间”概念的导入与发展简述(20世纪20年代—60年代) [J]. 时代建筑, 2014 (01): 152-157.

㉜赖德霖教授以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与发展的语境, 构筑了1930年代至当代的现代文人建筑发展脉络, 阐述了童寯、刘敦桢、汉宝德、冯纪忠、贝聿铭、王澍等八位“具导向意义”的重要建筑家的贡献。参见: 赖德霖. 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与发展之路上的王澍 [J]. 建筑学报, 2012 (05): 1-5.

㉝林徽因在《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文中, 归纳中国建筑两个类型及主要特征。“最后的一点关于中国建筑特征的, 自然是它的特种的平面布置。平面布置上最特殊处是绝对本着均衡相称的原则, 左右均分的对峙。这种分配倒并不是由于结构, 主要原因是起于原始的宗教思想和形式, 社会组织制度, 民俗习惯, 后来又因喜欢守旧仿古, 多承袭传统的惯例。结果均衡相称的原则变成中国特有的一个固执嗜好。例外于均衡布置建筑, 也有许多。因庄严沉闷的布置, 致激起故意浪漫的变化; 此类若园庭、别墅、宫苑楼阁者是平面上极其曲折变幻, 与对称的布置正相反其性质。中国建筑有此两种极端相反布置, 这两种庄严和浪漫平面之间, 也颇有混合变化的实例, 供给许多有趣的研究, 可以打消西人浮躁的结论, 谓中国建筑布置上是完全的单调而且缺乏趣味。但是画廊亭阁的曲折纤巧, 也得有相当的限制。”

㉞参见: 赖德霖. 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与发展之路上的王澍 [J]. 建筑学报, 2012 (05): 1-5.

参考文献

- [1] Amos Ih Tiao Chang. The Existence of Intangible Content in Architectonic Form Based Upon The Practicality of Laotzu's Philosophy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 [2] Dahong Wang. The Atrium Town House [J]. Interiors to come, 1945 (1): 68-69.
- [3] Henry—Russell Hitchcock, Philip Johnson. International Style, Architecture Since 1922 [M].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97.
- [4] 贝聿铭先生座谈会笔录概要 [J]. 今日建筑, 1954 (3): 25-26.
- [5] 陈其宽. 路思义教堂设计及施工简述 [J]. 建筑(台中), 1963 (11): 15-16.
- [6] 大师小传: 贝聿铭先生 [J]. 今日建筑, 1954 (2): 23-24.
- [7] 大师小传: 弗兰克·罗·赖特 [J]. 今日建筑, 1954 (4): 3-5.
- [8] 大师小传: 华尔德·葛洛培 [J]. 今日建筑, 1954 (1): 35-43.
- [9] 大师小传: 罗·柯必意 [J]. 今日建筑, 1954 (5): 11-19.

- [10] 大师小传: 麦斯·凡·德·罗[J]. 今日建筑, 1954 (5): 22-23.
- [11] 汉宝德. 中国建筑的 전통问题[J]. 建筑(台中), 1962 (4): 2-8.
- [12] 汉宝德. 从结构与形式看我国建筑斗拱之演变[J]. 建筑(台中), 1963 (8): 6-12.
- [13] 汉宝德. 发刊词[J]. 百叶窗, 1957 (1): 1.
- [14] 汉宝德. 记贺陈词师二三事[J]. 建筑师(台北), 1994 (8): 104.
- [15] 汉宝德. 建筑的精神向度[M]. 台南: 境与象出版社, 1971.
- [16] 汉宝德. 建筑国际运动的再认识[J]. 建筑(台中), 1963 (5): 5-7.
- [17] 汉宝德. 建筑思想与其情感向度[J]. 百叶窗, 1962 (1): 1.
- [18] 汉宝德. 明清建筑二论[M]. 台北: 镜与像出版社, 1972.
- [19] 汉宝德. 求新、求异、求变——为传统易容的刘国松[J]. 台湾美术, 1992 (5): 30-35.
- [20] 汉宝德. 我国当前建筑之自觉运动[J]. 建筑(台中), 1962 (1): 1-7.
- [21] 汉宝德. 新建筑反人文主义性格[J]. 建筑(台中), 1963 (7): 10-12.
- [22] 汉宝德. 筑人间——汉宝德回忆录[M]. 台北: 天下远见出版社, 2004.
- [23] 何卓恩. 自由主义的新遗产[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
- [24] 贺陈词. 与建筑关系最密切的东西文化问题[J]. 百叶窗, 1964 (3): 5-7.
- [25] 贺陈词. 中国建筑以及庭园艺术远播欧西的史实探讨及对欧西的影响[J]. 大陆杂志, 1971: 40-65.
- [26] 贺陈词. 中国庭园浅识[J]. 百叶窗, 1962 (2): 6.
- [27] 贺陈词. 作品评介[J]. 百叶窗, 1959, 4 (3): 20.
- [28] 贺陈词教授作品集[M]. 台南: 财团法人成大建筑文教基金会, 1995.
- [29] 华昌宜. 仿古建筑在台湾(上)[J]. 建筑(台中), 1962 (4): 10-15.
- [30] 华昌宜. 仿古建筑在台湾(下)[J]. 建筑(台中), 1962 (5): 36-41.
- [31] 黄宝瑜. 中国建筑史[M]. 桃园: 中原理工学院, 1961.
- [32] 黄庄巍, 邹广天. 从结构理性到儒家文明——卢毓骏和他的理论建构与延续[J]. 建筑师, 2021, (1): 123-131.
- [33] 黄作燊纪念文集[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 [34] 吉迪恩著. 方汝镇译. 地域建筑——现代建筑管窥[J]. 今日建筑, 1954 (3): 4.
- [35] 金长铭. 才与圣[J]. 百叶窗, 1959 (2): 6.
- [36] 金长铭. 东方艺术博物馆设计[D]. 弗吉尼亚理工学院, 1961.
- [37] 金长铭. 建筑造型新意义[J]. 今日建筑, 1954 (5): 2.
- [38] 金长铭. 教授住宅设计竞赛评语[J]. 今日建筑, 1954 (4): 49.
- [39] 金长铭. 空间结构的概念及其可能性[J]. 今日建筑, 1954 (2): 11.
- [40] 金长铭. 民主、极权与建筑[J]. 今日建筑, 1954 (1): 4-6.
- [41] 金长铭先生纪念集[M]. 台南: 成大建筑基金会, 2004.
- [42] 旧文重刊. 梁思成.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J]. 建筑(台中), 1963 (5): 5-7.
- [43] 赖德霖, 伍江, 徐苏斌. 中国近代建筑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 [44] 赖德霖. 汉宝德先生与《明、清建筑二论》——一份访谈笔记[J]. 建筑学报, 2014 (12): .
- [45] 赖德霖. 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 [46] 赖德霖. 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与发展之路上的王澍[J]. 建筑学报, 2012 (05): 1-5.
- [47] 李海清. 从“中国”+“现代”到“现代”@“中国”: 关于王澍获普利兹克奖与中国本土性现代建筑的讨论[J]. 建筑师, 2013 (1): 46-51.
- [48] 李渔. 闲情偶寄[M].
- [49] 廖建彰. 建筑神话——战后台湾“现代中国建筑”论述的形构(1940年代中~1990年代末)[D]. 台北: 台湾大学, 2001.
- [50] 林徽因文集建筑卷[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 [51] 林空. 中国建筑文化略论[J]. 今日建筑, 1954 (11): 26-28.
- [52] 刘国松. 试论写意画的发展[J]. 百叶窗, 1961 (2): 6.
- [53] 刘以伸, 梁异. 建筑问题应答[J]. 百叶窗, 1959 (3): 13.
- [54] 刘以伸. 自建筑精神价值谈中国现代建筑之方向[J]. 百叶窗, 1961 (3): 14-16.
- [55] 卢毓骏. 现代建筑书刊简介[J]. 今日建筑, 1954 (2): 20.
- [56] 闵昌, 卢永毅. 中国现代建筑“空间”概念的导入与发展简述(20世纪20年代—60年代)[J]. 时代建筑, 2014 (1): 152-157.
- [57] 台湾省建筑技师公会庆祝成立二十周年专刊[M]. 台北: 台湾省建筑技师公会, 1970.
- [58] 唐君毅.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 台北: 正中书局, 1953.
- [59] 童雋. 江南园林志[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 [60] 汪坦. 1948生活在赖特身边[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 [61] 王大闳. 台湾大学学生活动中心[J]. 建筑(台中), 1962 (1): 19-20.
- [62] 王大闳. 中国现代建筑能存在吗[J]. 百叶窗, 1963: 51-53.
- [63] 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11.
- [64] 王济昌. 漫谈造园[J]. 今日建筑, 1955 (8): 54-53.
- [65] 希格弗莱德·吉迪恩. 空间·时间·建筑——一个新传统的成长[M]. 王锦堂, 孙全文, 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
- [66] 萧百兴. 依赖的现代性: 1950—60年代台湾学院建筑论述之形构[D]. 台北: 台湾大学, 1998.
- [67] 须弥芥子——陈其宽八十回顾展[M]. 北京: 中华文化联谊会, 2000.
- [68] 徐明松. 建筑师王大闳[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
- [69] 徐明松, 王俊雄. 粗犷与诗意——台湾战后第一代建筑[M]. 台北: 木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7.
- [70] 许纪霖.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71] 殷海光. 中国文化的展望[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 [72] 张其昀. 景福门回忆录[M]. 台北: 台湾中国新闻出版公司, 1962.
- [73] 张旭东. 启蒙主义“伦理自觉”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5 (7): 1-24.
- [74] 郑大华, 邹小站编. 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75] 郑大华. 民国思想史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76] 郑大华. 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民族主义[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77] 致读者[J]. 今日建筑, 1955 (8): 1.
- [78] 周琦, 庄凯强, 季秋. 中国近代建筑师和建筑思想研究刍议[J]. 建筑师, 2008 (4): 102-107.

图片来源

图 1:《今日建筑》1955 年第 8 期

图 2:《陈其宽八十回顾展》

图 3:《今日建筑》1955 年 2 月刊,《建筑师》(台北) 1978 年 12 月刊

图 4:《建筑师》(台北) 1978 年 12 月刊

图 5:《东海风》

图 6:《贺陈词教授作品集》,《百叶窗》1959 年第 3 期

图 7:《建筑》(台中) 1962 年第 1 期, 1963 年第 11 期

图 8:《建筑》(台中) 1962 年第 3 期